

【文化观】

# 杯盏茶香传古韵

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饮茶场景。

□李学朴

中国是茶的故乡，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。同时，由于古代陶瓷业的悠久，古人的茶具更是丰富多彩，琳琅满目。它既是茶文化的宝贵历史遗产，同时又是代表各个时代的工艺美术精品，堪称世界一绝。

最初人们喝茶是用饮食器具。一器多用、一具多用是古代社会各种器具的共同特点。专用茶具的出现是饮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，人们感到需要一种专门器具的时候而产生的。也就是说，茶叶的利用在前，茶具的产生在后，并不是一同问世的。

茶具是指与饮茶有关的专门器具，公元前一世纪，四川王褒所著的《僮约》中有：“武阳买茶”“烹茶尽具”之类的记载，由此说明当时煮茶已经有专门器具。唐代以前，各地使用茶具的情况较为复杂，除一般使用碗、杯之外，某些地方还有用酒器来饮茶的情况。那时，富豪之家的碗、杯多是用金锡制成的精美器具，一般平民饮茶主要使用陶瓷碗。

唐代时，盛行饮茶，士大夫和文人多以饮茶为韵事，他们不仅讲究茶叶的色香味及烹茶方法，对茶具也非常重视。唐代中期，陆羽著《茶经》，对唐代各地所产的茶具作了细致的比较和评论，他说：“碗，越州上，鼎州次……洪州次”“邢不如越”“若邢瓷类银，则越瓷类玉”“若邢瓷类雪，则越瓷类冰”“邢瓷白面茶色丹，越瓷青面茶色绿。”

邢窑在今河北省内丘县，它在唐代生产的白瓷瓿，是当时很流行的茶具。唐代李肇《国史补》说：“内丘白瓷瓿，端溪紫石砚，天下无贵贱通用之。”可见其生产规模之大和影响之远。越窑在今浙江余姚、绍兴一带，陆羽《茶经》说：“瓿，越州上，口唇不卷，底卷而浅，受半升。”越窑所产的瓿，曾经风靡一时，因而历代留下了不少赞美越窑茶具的诗篇，如唐人顾况《茶赋》云：“舒铁如金之鼎，越泥似玉之瓿。”孟郊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》中有：“蒙若玉花尽，越瓿荷叶空。”施肩吾《蜀茗词》言：“越碗初盛蜀茗新，薄烟轻处搅来匀。”

陆羽从品茶的角度，抑邢扬越，认为越窑瓷器质量应在邢窑之上。对此，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第三编认为：“陆羽按照瓷色与茶色是否相配来定各窑优劣，说邢瓷白盛茶呈红色，越瓷青盛茶呈绿色，因而断定邢不如越，甚至取消邢窑，不入诸州品内……瓷器应凭质量定优劣，陆羽以瓷色为主要标准，只能算饮茶人的一种偏见。”色彩的好恶，带有个人的主观心理作用，这可能因为陆羽是处士，他比较欣赏青绿色这种静态的色彩，这种色彩可以使观赏者的心情趋向于宁静淡泊。

唐代的茶碗比饭碗的器形要小，器身较浅，器壁成斜直形，敞口浅腹，适于饮茶。越窑和邢窑的茶碗，造型风格又各有特点，邢窑的茶碗比较厚重，口沿有一道凸起的卷唇，它与越窑茶碗“口唇不卷”，胎体轻薄的作法有明显区别。越窑除了具备“掬翠融青”的釉色之外，造型也很优美精巧。从皮日休的“圆似月魂堕，轻如云魄起”，和徐夔的“巧剡明月染春水，轻旋薄冰盛绿云”等诗句中，可以想见越窑青瓷茶碗形质之美。

与茶碗相配套的茶壶在西晋就已经出现，从晋至隋，茶壶的式样流行一种鸡头壶，即茶壶的流子（嘴）都是作鸡头状。到唐朝，茶壶称为注子，或称茶注，这时的壶式，普遍以短形小流代替了过去鸡头饰流。

到了唐代，还首创了一种饮茶用的碗托，用以托茶，称为茶托，又称盏托。李匡《资暇录》卷下记载：“始建中，蜀相崔

宁之女以茶杯无衬，病其熨手，取攄子承之，既暖而杯倾，乃以蜡环攄子中央，其杯遂定。即命匠以漆环代蜡，进于蜀相。崔大奇之，为制名而话宾友。于是传者更环其底，愈新其制，以至百状。”茶托的器形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。曾在浙江宁波出土了一批唐代越窑青瓷器，其中就有带托连烧的茶碗。茶托口沿卷曲作荷叶形，茶碗则作花瓣形，加以釉色青翠，所以唐末诗人徐夔将茶和盛茶的茶具比之“嫩荷涵露”。

唐宋以来，文人作诗赋词称颂茶德，饮茶成为一种“雅道”，茶具也成为一种雅器。唐朝饮茶一般用碗，宋朝以后就不用碗而改用盏了。盏实际上也是一种小碗，但比唐代的碗小巧精致。由于宋朝盛行用盏饮茶，盏托使用更加普遍，而且制作也比唐朝精细多姿，盏托的托口突起，托沿多为莲瓣纹，托底中凹。茶壶到南宋时，壶式明显由饱满变得瘦长，北宋的茶壶，流子多在肩部，而到南宋末年，流子已移至腹部。

宋代茶具有了三个变化。一是烧水用铫，俗称吊子，器小、有柄，便于提携。有嘴，注汤方便，又富美感；二是流行福建建州产的黑盏，是种厚壁敞口的小碗，厚壁，宜于保温，敞口，盏面大，能容纳更多的茶花。注水后，末茶浮于盏面，呈白色，宋人称“茶花”，为茶精华，斗茶胜负，由此而定，黑盏最能与白色的茶花相映，别的颜色没有黑盏效果好。有一种黑盏花纹细密如兔毛，称“兔毫斑”，又有像鹧鸪颈上云状羽毛，称“鹧鸪斑”。宋代茶具特贵金银，宋人周密《癸辛杂记》记：“长沙茶具，精妙甲天下，每副用白金（即银）三百星。”又作大缕银盏，贮银茶具。赵南仲为湖南地方官时，曾用千两黄金制作茶具，进贡朝廷。金银茶具流行天下，“士大夫家有之，置几案间”，“以侈靡相夸”，但不常用，成为一种摆设。

到明清时，茶风大变，废团茶，行散茶。茶不碾末，也不煮饮，而是直接冲泡，不加调料，重视茶的真色真香真味。茶具不再繁琐，一壶一盏即可，呈现一种返璞归真的趋向。明朝时人们审美情趣以淡雅为宗，茶具也从唐宋贵银崇金转向质朴的陶瓷，简单至极，壶杯的造型、彩绘却精致至极。由于不再流行斗茶，茶色崇尚天然的翠绿，茶盏也不再贵黑而尚白。明人张源《茶录》说：“盏以雪白者上。”白瓷衬映绿色的茶汤，更显得清新雅致，悦目自然。明代制瓷技术登峰造极，白瓷“薄如纸，白如玉，声如磬，明如镜”。瓷茶具成了精美的艺术品。清朝《帝京景物略》记，明代成化时一对斗彩的瓷杯，值十万钱。瓷器容易破碎，难以保存，乾隆诗云“李唐越器人间无，赵宋官窑晨星看”。

清代，茶文化呈现出多元面貌。“文士茶”勃兴，改宋元的“点茶”为“冲茶”，将茶叶直接投入壶中冲泡，再转注茶杯饮用，奠定了今日的泡饮方式。清康、雍、乾三代是清官茶具制造的鼎盛期，出现了粉彩、珐琅彩、仿木石等创新茶具。从茶具形制讲，除茶壶与茶杯外，盖碗是清代茶具一大特色。盖为“天”、碗为“人”、托为“地”，一副茶具就是一个小天地，包括古代哲人“天盖之，地载之，人育之”的道理，充分展现了古人有关器用之道的哲学观。当然，清代的茶碗并非全部带盖，而是在烧制中即分为盖碗和碗两类。

中国古代茶具种类非常丰富，造型优美，既有实用价值，又富艺术之美，所以驰名中外，为历代饮茶爱好者所青睐。古代一些茶具上还常绘有白鹤飞翔、游龙戏凤、翠鸟舒翼、彩蝶恋花、人物美女、各种花卉、山水画等图案，诗情画意，尽在其中。因此，人们在品饮茶叶芳香之时，还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些茶具的艺术之美，为品茗平添一番情趣。

【短史记】

## 古代的“隔离医院”

□郑学富

在科技和医学都不发达的古代，一旦来了疫情如何应对？其实，古人也很有智慧，有很多防治的办法，如药酒、掩埋尸体、建隔离医院、药物医治等。

### 秦朝的“疠迁所”

秦朝时就设有疠迁所，是当时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治疗医院，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，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医院。

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的秦代竹简（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）上记载：“城旦，鬼薪疠，何论？当迁疠迁所。”“城旦”是秦朝的劳役刑之一，是指强制男性犯人早起去修筑城墙的苦役；“鬼薪”是秦朝时的一种徒刑，指从事官府杂役、手工业生产劳动以及其他各种重体力劳动等；“疠”指麻风病。在秦朝，人们如果发现身边有人染上麻风病时，要立即向官府报告，官府将患者抓捕后，经过医生确诊，将其送到疠迁所进行强制隔离，以防止麻风病毒传播蔓延。

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在“封诊式”一节里详细记录了一个病例：某里的里典甲将该里士伍丙送到官府，报告说：“怀疑他是麻风病，将他送到。”官员问丙，丙供称：“在三岁时患有疮伤，眉毛脱落，不知道是什么病，没有其他过犯。”官员命医生丁对丙进行检验，丁报告说：“丙没有眉毛，鼻梁断绝，鼻腔已坏，探刺到他的鼻孔，不打喷嚏，臂肘和膝部……两脚不能正常行走，有溃烂一处，手上没有汗毛，让他呼喊，其声嘶哑，确诊是麻风病。”

### 西汉的“隔离医院”

汉平帝刘衍即位时才9岁，实际是由大司马王莽主持朝政。这个小皇帝也是多灾多难，在他改元的第二年就发生了大灾难。《汉书》记载，元始二年（公元2年）四月，郡国发生大旱灾，蝗灾，青州尤为严重，赤地千里，饿殍遍地，瘟疫大流行。

面对严重的灾荒和疫情，王莽积极布置救灾防疫，并带头捐款。在他的带动下，230名官民献出自家的田地住宅，以救济灾民。灾区还普遍减收租税，灾民得到充分抚恤。王莽还在长安城中造一条间里，建邸舍房屋200区，朝廷将灾民中的染病者安置在其中，派来医生，送来药品，进行隔离医治，以防止相互传染。

另外，朝廷还撤销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，改为安民县，建起官署与住房，招募贫民迁居于此，由县官发给口粮，并分配土地与生活用具，借给犁耙、耕牛、种子和粮食，让灾民病愈后在这里安居乐业。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，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，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媲美。

### 唐朝的“病人坊”

唐代时的长安城人口增多，人流量大，疠疫传播快，当时有官办、民办的传染病院，一些寺院也辟有病人坊。

《太平广记》引《纪闻·洪昉禅师》说：“昉于陕城中，选

空旷地造光寺，又建病坊，常养病者数百人。”而且做到男女分住，给予一定的供养和照顾。五代冯鉴著《续事始·病坊》载：“开元二十三年，断京城乞儿官，为置病坊，给廩食焉。近代改悲田院，或曰养病院。”

《元和志》载：“唐至德二年冬月丙寅，筑养疾院于泾阳。”《泾阳史话》说，肃宗第十一太子嘉纪居此疗养达三年之久，后来成为达官贵人隔离疗病的医院。当时设有太医、医生、医士，药承和徒工30多人，并有御林军武士，兵勇20多人侍从保护。有时养疾院还派医士给附近民众看病，舍药给他们，并讲解一些治疗疾病的知识，介绍一些药方。唐代晚期，朝廷将官办的养疾院改为“养济院”，收容贫困无依靠的病人，请有医技的僧医来院为百姓治病，民众称其为“孤贫院”。患者病愈后，留在院里干些杂务和耕种，以院养众。

### 宋代的“安济坊”

北宋文学家苏轼对中医颇有研究，在医药、养生和防疫方面有很多建树。苏轼曾专程到老家眉山拜访当地名医巢谷，寻医问药，恳求防治瘟疫的药方，得到好友巢谷的祖传秘方“圣散子”。苏轼在《圣散子叙》中说：“若时疫流行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，不问老少良贱，各服一大盏，即时气不入其门。”

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七月，52岁的苏轼得到皇太后的恩宠东山再起，到达杭州任太守。在他上任不久，杭州大旱，颗粒无收，饥民哀号，流离失所，造成疫疾大流行。苏轼立即上奏朝廷，请求免去本路上贡米的三分之一，又得到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，用以换取粮食救济饥饿的人，向贫病交加的百姓减价出售常平仓的大米，以解饥荒，这才稳定了物价。他还命令官府做了很多饘粥，救济饥民，又拿出圣散子方，配成药剂发给患者，并派官员带着医生到各街巷为患病者医治，救活了很多。

苏轼在《圣散子后叙》中说：“去年春，杭之民病，得此药全活者，不可胜数。”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能从长远考虑，他深知“杭，水陆之会，疫死比他处常多”，于是苏轼将朝廷拨付的修缮费节约出来的2000缗钱拿出来，自己又慷慨解囊，捐出50两黄金，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，很快建起了一处病坊，取名“安乐坊”。据记载，安乐坊在三年时间里就医好了上千个患者。苏轼还风雨绸缪，广蓄粮米、药品，以备急用。

后来，朝廷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做法，将安乐坊收归朝廷管理，更名为“安济坊”，聘请道士主持经营，并拨付经费，还赐给该院医护人员“紫袍”，使其具备了官员身份。宋徽宗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，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，专为穷苦人治病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